

话说“新大楼”介地界儿

公司“新大楼”所在地毗邻月牙河,为原天津市地毯厂,此处过去是近代天津贾家沽道的辖区,而由此顺着月牙河向南走出一公里处,是过去的两个老村落,在一百多年前同样是闻名遐迩。它们是月牙河东面的吴嘴村和西面的张达庄,都具有着浓郁的民间文化色彩,单单是村名就有着很多传说……

吴嘴村 1934年天津市、县划界,原四乡组成的天津县实行分治,原乡区所辖的大直沽、土城、东楼、谦德庄、李七庄等划入市区。市、县勘界后,市、县区域东至牛圈,东南至吴家嘴,南沿津浦支钱,西至西营门,西北至黑塔寺,北沿北宁铁路。由此,现在东丽和河东交界的吴嘴曾经是曾经响当当的地名。

“嘴”在天津地名中的意思是“河湾”,天津带“嘴”地名有东嘴、陈嘴、散嘴、芦嘴、梁家嘴、霍家嘴、吴家嘴等等。关于吴嘴村名的来历在当地有这样的传说: 明朝年间,燕王率军挥师扫北。一日,燕王带领他的将士们来到天津卫的东部,只见有一条河成月牙状围圈围定一个村子。燕王用手一指,就对部下——四个姓吴的弟兄们说,这块地方归你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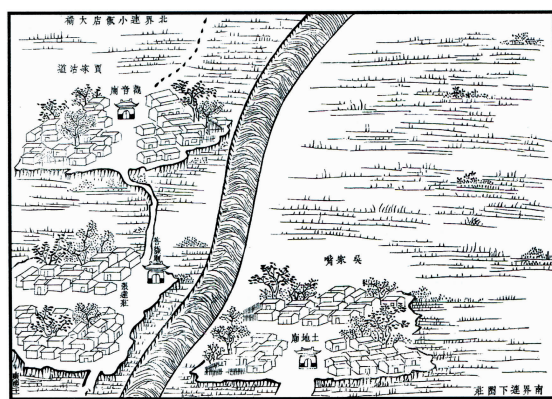
吴家兄弟骑着大马围着这块地方转了一圈,这叫跑马站圈。吴家兄弟从此在这种劳作,日久天长哥几个考虑得给这块地方起个名字,哥几个一商量,觉得这个村子被清亮的月牙河围着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嘴,于是就起了个吴家嘴。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解放前,天津东郊土匪闹得很凶,特别是近郊的堆地一带最为猖獗,可是因为“吴嘴”的叫法,这一带相当太平……

这里的老年间人都说,海河沿岸这几个村,吴嘴这地方,土匪都不敢来,土匪来了,先被“吴嘴”吃掉,这个村名,土匪先头头,把嘴儿一张,准没跑。紧跟着,进了肚儿(杜庄子),进肚儿了,往下就馊口儿(把嘴缝上了),过河就是鬼堆,就是现在的灰堆,乱葬岗子就给埋了。这个笑话听来可笑,可当时还真还太平了一阵子。

张达庄 张达庄在月牙河以西,与解放后定名划片的贾沽道接壤。张达庄,明永乐年间建村,燕王朱棣扫北征讨蒙古,将不少从蒙古草原上俘虏和押解的蒙古族押解到天津安置。据传朱棣部下将领张进宝即在扫北后率一批蒙古士兵在天津定居,人们称其为“张鞬子”,所居住的村庄称“张鞬庄”,后避俗求雅

“河东河西”故事多



《津门保甲图说》中的贾家沽道、张达庄、吴家嘴,中间流经的河流为月牙河

演化为“张达庄”。 这个说法源于《天津地名志》河东卷,其实还有另一版本的张达庄的由来:海河最早的河口是现在的狮子林桥的望海楼。从三岔河口往下,全是一片汪洋。那条月牙河正从张达庄边上流过。月牙河在早年间也是条好宽好宽的大河,每天也是涨潮落潮的。河两岸的土地很肥沃,荷花莲藕,鱼虾螃蟹,米粮豆菜,真是要什么有什么。老辈人都管这个地方叫“河北小江南”。

最早到这地方定居的是燕王扫北时从北面带回的“鞬子”兵,按现在说法,就是俘虏兵。在这些兵里有个“鞬子”姓张,他是这伙俘虏兵的头头儿。这个人膀大腰圆,浓眉方脸,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英雄气。他的武艺也很高,打仗很勇敢,为人又讲义气,手下兵卒都爱戴他。他有如此本领,又怎么会叫燕王给俘虏了呢?原来燕王领兵扫北,打到在昌黎附近。张鞬子的上司见敌军攻来,就命张鞬子领兵迎击,两支军队在野地里摆开阵势,张鞬子惯用长枪,他横枪拍马冲杀过来,立刻就

上整个扔了下来,对方战将一看,顺手一枪,就朝他脑袋扎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张鞬子把嘴一张,只听“咔嚓”,一看,竟把枪尖交住了,可对方武将抽枪准备再刺时,在阵前观战的燕王命令鸣金。“叮叮叮”一阵锣响,双方收兵回营。张鞬子死里逃生捡条命。他收拾人马回到城里,刚要进帅府交令,不想帅府里冲出几个侍卫,二话不说,上前用绳子将他绑了,带进元帅府。那元帅大骂张鞬子阵前通敌,是敌将故意放他不杀,这回可屈死张鞬子啦,他哪里是通敌,分明是用牙齿的硬功咬住敌将的枪头,才免得一死的。可元帅不给他回话,伸手掷下一支令箭,叫左右将张鞬子推出斩首示众。

张鞬子连呼冤枉。那元帅冷笑,立刻叫左右押上一个兵卒上来。那兵是燕王的兵,却穿着他们的服装。从那兵卒身上抄出一封信,那信的内容是约张鞬子“反水”的。张鞬子见此信内容,立刻仰天长叹:“吾命休矣。”

张鞬子被押赴刑场,泪流满面。其实那封信和张鞬子一点瓜葛都没有。原来燕王素闻张鞬子武艺高强,恰巧在阵前他又马失前蹄,于是燕王有意在阵前鸣金,又派出士兵送出假信,故意造成对方将帅猜疑。果然,一听说张鞬子私通敌人,辽国军心大乱。正在这关口,燕王又命队伍强攻,一下子就攻破城池,连元帅府都给围住了。对张鞬子行刑的刽子手,赶忙扔下鬼头刀,自管逃命去了。

张鞬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叫燕王给逮住了。后来燕王手下的人都劝他投降燕王,为燕王做事,张鞬子死也不应承。燕王也没有杀他,只是命人随军押解。再后来燕王扫北大获全胜,领兵回朝。这时他认为张鞬子已不能对朝廷构成多大威胁,于是就叫张鞬子和家人以及十几个鞬子兵定居在月牙河和海河交汇处。张鞬子看中海河梢头这块地方也不错,因为那时这些人想从陆路逃回家乡很不容易,朝廷派兵看得紧哩,所以张鞬子想在这住个三五年,瞅空子从水路逃跑。可是没想到,朝廷也防着一手哩,招来一些乡下女人,给那些鞬子兵们都成了家。这样一来,手下人有了拖累牵挂,想返回老家的念头一天比一天淡薄,况且这里水美地肥,又是鱼米之乡,比老家的穷山恶水强过百倍,于是都铁心在这呆下去了。不过,那些鞬子对张鞬子还是像在军队里那样敬重,都听他的话。在这里住的人家非常团结,谁家有啥难处,大伙帮着解决,看到女人老人到河边担水,谁都主动去帮着挑。现在,这个庄名没变,只是改成张达庄了。

消逝的红色学校——贾沽道小学

2003年5月,因河东区教育局调整,贾沽道小学并入汪庄子小学。2008年7月,在贾沽道小学原址处投资建金月湾花园,自此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红色学校消逝了。

1904年,由贾家沽道村内富户孙氏家族废庙兴学,建立私立第二十四初等小学堂,历经孙俊卿、孙冰如叔侄的聚力兴建,三十年代末已具规模,享誉津沽。几经沿革,1956年定名为贾沽道小学,其坐落在津郊月牙河两岸的贾沽道村南,曾经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一个地下活动基地。

1939年至1943年是日本统治下的天津最黑暗的时期,一切抗日组织都被严禁,在此期间,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联系的二位爱国青年杨子文、王凌冰,通过孙冰如的关系先后来到贾家沽道小学任教。她们曾就读于天津三八女中,情同姐妹的爱国青年的到来,犹如两颗明星,照亮了校园。她们在抗日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培养了大量的抗日积极分子。

当时,日伪当局强迫学校使用规定的教材,曲解中国历史,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中日满提携”,妄图从思想上奴化年轻一代。杨子文、王凌冰则针锋相对,不受规定教材的限制,自选自编教材,或有选择地使用规定教材,但加进新的内容。如杨子文在历史课上讲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在国文课上



贾沽道小学1942年毕业班合影

讲述《卖儿啼》、《鬻孙谣》、《苛政猛于虎》等古文,并结合现实讲工人、农民的悲惨生活,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道理。 二位老师爱国之心赤诚,深得全校师生和校长、校董的爱戴,学生们对二位老师的教诲刻骨铭心。她们对贫苦学生关怀备至,经常以家访为名,深入学生家中或田间地头,帮助干活,促膝谈心。她们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遇到兵强马壮或风吹草动,她们就去学生家中躲避。

1943年初,杨子文、王凌冰把几名重点培养的高年级学生组织起来,以“读书会”名义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鼓舞学生们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这几名学生快要毕业时,杨子文、王凌冰说服学生家长再熬几年,又从董重孙冰如处争取到奖学金,帮助他们到城里上了中学,并通过“读书会”形式继续同他们联系,指导他们开展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发展他们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们又在历届毕业生中发展党员,并培养了大量的党的积极分子。

学校创办数十年,由于封建制度的羁绊,很少有女孩子入学,这一带妇女几代人没有几个识字的。加之受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毒害,妇女们相信的吉凶祸福是命中注定,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缺乏抗争意识。对此,杨子文、王凌冰以及进步教师武敬容痛心疾首,决心唤醒妇女姐妹。在孙冰如支持下,贾家沽道小学特设了妇女识字班。

抗战胜利后,原“青抗先”领导成员均通过地下关系郑锡如联系到杨子文、王凌冰到校任教,1946年春建立了由他任支部书记的贾家沽道小学地下党支部。党支部决定开展社会义务教育,帮助妇女姐妹从封建桎梏中摆脱出来。后来,女学生达到一百多人,一些二十多岁的大龄妇女也积极参加学习。在学校里,党支部也重点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为天津1949年1月解放后接管城市建立政权输送了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命名贾沽道小学为“中共地下党活动基地”。 (刘若芳)

雅音绕舌

今意——记双欣项目大学生

春暖花开起,长河清影凉。 京能驻伊盟,津电因铁将。 采风见大漠,淘沙过九江。 关塞何苍茫,随阳雁归乡。 弱龄负奇节,警事犹思量。 投笔弃儒生,双欣战百障。 皓月照霜白,挥臂方道壮。 会立万里功,视君封侯相。

日子

中国,有一个日子很庄严 一九四九年的天安门城楼上 领袖向世界的宣言

中国,有一个日子很激动 亿万人民眼里 都盈满了热泪 从“七一”到“十一” 不过九十天 历史却走了七十年 每迈一步 都是草地雪山 还有沼泽深处 淤泥策划的阴谋 于是,多少人 用倒下的铮铮铁骨 去赢得站立的尊严

中国,有一个日子很灿烂 美丽的梦向世界招展 我们的声音响彻蓝天

家乡感怀

泛着麦浪稻浪的土地 飘着油菜花香的土地 澎湃着蛙歌鸟语的土地 繁衍神话和童谣的土地啊 被勤劳 美化得五色斑斓 无论我驰骋到哪里 也不管是得志 还是遇到灾难 到了老年 你仍是我回返的港湾 最后 回到你的怀抱

七绝·游枫桥

寒山冷月水盈川,桥跨江城玉带缠。 重返天涯孤客梦,钟声诗韵两悠然。

读史谈粹

患难见真情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自古以来就是人海之地,多条河流汇聚于此。加之地势低洼,解放前水利设施又不完善,上游一旦同时涨水,下游便一片泽国。因此三年一小涝、五年一大涝在那时已成家常便饭。纵观民国年间的灾水记载,不难发现形势最危急、局面最严重的当数1917年和1939年的两次。

1917年夏,天津及周边地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在杨柳青年画中,有一幅《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就生动详实地描述了镇上洪水肆虐的场面。看画面上波涛狂澜,巨浪滔天,不难想像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大灾之年,也有大爱。社会各界的慈善救济在那个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官方赈济,还是民间救助,八方人士纷纷解囊相助,一时间天津各地粥场、暖棚遍布,以解燃眉之急,救黎民于水火。

水患过后,每一位百姓都会怀有一颗感恩之心。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还在当年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词句:“幸蒙甘霖特霁,厚德博施,俾涸辙之鱼顿获西江之水,穷途之鸟欣得北海之云,一饭之恩千古佳话,沾濡雨露不啻载德华嵩承恩江拜矣。铭心镂骨,没齿难忘。”在那个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并不发达的年代,报纸可能是唯一受众面较大的舆论媒介。也正因此,各种各样的灾民感谢信,像雪片一样被寄到报社,各大报纸也就在此时集中刊登出名单繁多的感恩之词。笔者在1918年2月6日的《益世报》上就看到了第一篇杨柳青灾民为表达谢意的信函。题目为《青镇灾民来函鸣谢》,原文如下:

“兹接青镇灾民来函云。敬启者,敝镇侨居潮疆君关心桑梓乐善不倦。庚子之役,敝镇人民即受惠不浅。本年秋间,洪水泛滥,诸君更募新款,专营赈济,并组织团体‘青镇旅潮潮服务联合会’。先散放面粉,继又添放玉面,闻共捐银一万五千元之多,沾惠者竟达七千五百余户之多。当此嗷嗷待哺之时,获此莫大补助,食德之余口名感激云。”

可见当年赶大营的杨柳青同胞,素来关心家乡。在庚子事变中就曾施以援助。民国六年的大水中,为募捐捐款又专门成立“青镇旅潮潮服务联合会”。根据报道的数字来看,约用银一万五千元,购买面粉和玉米面以发放赈济,受援助对象超过七千五百户。按照一户三口计算,人数两万有余。

所谓患难见真情。老报纸上这一条短短报道,是杨柳青的大营客们心系故土的最好见证吧。

流年碎影

那年到过天津电建的文学腕儿

2005年盛夏时节,正当天津电建托电工程建设者挥汗拼搏在“西电东送”主战场之时,由大唐集团公司组织的“大唐光明行”——中国作家看大唐采风团一行18人风尘仆仆来到了托克托电厂,他们也走进公司承建的托电现场区域,来寻访熔铸在巍峨电站中的沧桑巨变和感人篇章。 前来采风的作家有:著有《那五》、《烟壶》的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邓友梅,著有《高山下的花环》、《沂蒙九章》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著有《小镇上的将军》、《惊涛》的江西作协主席陈世旭,著有《那山、那人、那狗》的湖南文联副主席彭见明,著有《梨花湾的女人》的河北作协副主席何申,著有《海迪之歌》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蒋元明、《中国劳动保障报》副总编辑胡文佩、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等人。

随艺情致

书缘无尽

近日,2019书香天津·读书月启动了,而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纸媒一步步受到冷落,也使我这个喜欢读书的人感慨万千。

《辞海》中,“书”的本义被解释为“书籍;装订成册的著作”,这九个字的简明扼要的概括显然是抽取了书的本质所在的最好的定义,可同时也扼杀了书的“生命”,把它简化成一个没有呼吸、没有气味、没有知觉的“物体”。可在我心里,“书”是一个鲜活的字眼,它仿佛是一个跃动着精灵,有着旺盛而丰富的生命力,怎么简简单单的九个字就把它变成了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了呢?在我看来,对书如果仅仅抱着拥有和阅读的目的,那都不能算作真正“懂得”书的人,而只能称其为“用书”的人。只有那些把书看作是朋友,一个有缘才会相识相知的人,才能说得下是真正“懂得”书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从小到大经手过的书不能说多,但也不少,而且种类繁多、门类众多。从启蒙时的童话书、故事书、小人书,到上学后每日必须面对的种种教科书、辅导书、工具书,长大后又可能接触到的各类义学、艺术、史学、哲学、文化类书籍。面对着终了我们一生也无法到达彼岸的书海,我们能说与书相识、相知不是一份不浅的缘分吗?想想有多少

天津卫电力发展趣谈

新中国初期的天津电力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冀北电力公司天津分公司。同年3月1日,中纺七厂的自备电厂租给天津分公司,改称第四发电厂。1949年6月,天津分公司划归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改称华北电业公司天津分公司。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电业公司隶属中央燃料工业部,改称华北电业管理总局。当时发电规模最大的的是河的第一发电厂(建于1937年的天津发电所)。

解放时,天津电业系统共有职工1965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业务骨干和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技术工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解放后天津电力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专业技术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还抽调一些骨干,支援华北、东北、西北等地电力工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老电业基地的作用。

1950年1月,华北电业管理局将天津分公司改称天津电业局。1953年12月,法商电力公司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天津电业局接管改称第五发电厂。1954年实行一厂多站,将二厂(滨江道发电所、黄家花园发电所)、五厂合并为第二发电厂,三厂(金家窑发电站)、四厂(小于庄发电所)合并为第三发电厂。1956年4月,北京电业局成立,统一管理京(北京)津(天津)唐(唐山)张(张家口)电网。天津电业局撤消,其所属发电厂及天津地区供用电系统直接由北京电业局领导。

建国初期,天津市对旧电厂进行了以恢复铭牌出力为主要目标的大修。当时职工面对破旧不堪的机器设备摊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修复老旧的电力设备,恢复发电,他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原第四发电厂工人王家珍解决了发电机励磁问题,荣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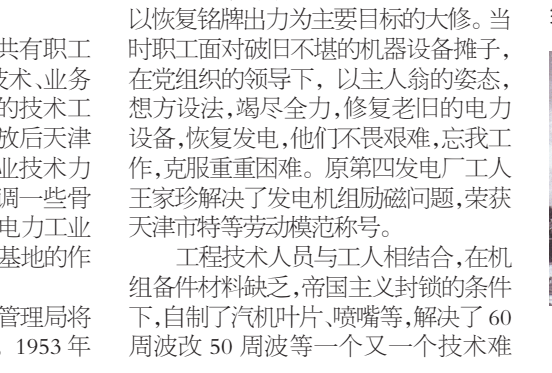
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相结合,在机组备件材料缺乏,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自制了汽机叶片、喷嘴等,解决了60周波改50周波等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和技术骨干,有的被誉为“静子大王”、“转子大王”、“革新能手”等。由于广大电业职工的艰苦努力,经过三个春秋奋斗,1953年,天津电业系统陈旧设备全部恢复了铭牌出力,60赫兹自备电厂大都改为50赫兹,与地区电网并网运行,挖掘了自备电厂的潜力。1955年以前,在没有增添新机组的情况下,靠原有的设备,发电量由建国初期的2.05亿千瓦时提高到1955年的4.73亿千瓦时,提高了50%以上。这一时期,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老设备的作用。

褚墨留痕

安全 生命至高无上 安全责任为天

王凤 作

天津解放时的第一发电厂



天津解放时的第一发电厂